

北京大學國學研究院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

第三十七卷

國學研究

北京大學國學研究院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

國學研究

第三十七卷

主 編

袁行霈

編委(按姓氏筆畫排列)

王小甫	王邦維	吳同瑞	袁行霈
陳 來	高崇文	張學智	程郁綬
董洪利	趙匡華	趙爲民	鄧小南
蔣紹愚	樓宇烈	閻步克	錢志熙
嚴文明			

特約編委

許逸民



北京大學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二〇一六年·北京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國學研究. 第三十七卷/袁行霈主編.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6
ISBN 978-7-301-27201-5

I. ①國… II. ①袁… III. ①國學—中國—文集 IV. ①Z126.27-5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6)第 122679 號

封面刊名:集蔡元培先生手迹

書名	國學研究(第三十七卷) GUOXUE YANJIU
著作責任者	袁行霈 主編
責任編輯	徐丹麗
標準書號	ISBN 978-7-301-27201-5
出版發行	北京大學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海淀區成府路 205 號 100871
網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北京大學出版社
電子信箱	pkuwsz@126.com
電話	郵購部 62752015 發行部 62750672 編輯部 62752022
印刷者	北京大學印刷廠
經銷者	新華書店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6 開本 25.25 印張 388 千字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價	60.00 圓

未經許可,不得以任何方式複製或鈔襲本書之部分或全部內容。

版權所有,侵權必究

舉報電話:010-62752024 電子信箱:fd@pup.pku.edu.cn

圖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請與出版部聯繫,電話:010-62756370

本刊之出版，先後承蒙南懷瑾、查良鏞、駱英、林振芳等先生暨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慷慨資助，特此致謝。

目 錄

世變與應變

- 孫應時及其學友在慶元黨禁前後的遭遇與應對 黃寬重(1)
- 康有爲、章太炎的古代官階研究(續篇) 閻步克(57)

國史的拓展

- 對紀傳體史書紀與傳演進的比較探討 聶激萌(91)
- 陶淵明的書架和蕭綱的醫學眼光
- 中古的閱讀與閱讀中古 田曉菲(119)

鄭虔、鄭潛曜與杜甫的關係淺析

- 兼談鄭氏叔侄對杜甫旅食京華所起的作用 伍鈞鈞(145)
- 簡論《三國演義》中的讖謠 方新蓉(171)
- 曹家上世與西方的接觸對曹雪芹創作《紅樓夢》的影響 向 彪(183)
- 《洪範五行傳》成篇與作者問題新證 程蘇東(213)
- 朱子書信年代新考 許家星(240)

隋唐天台宗“外典”與義疏學之關係

- 《弘決外典鈔》引《孝經述議》校讀劄記 童 嶺(263)
- 經學文獻的目錄學研究 顧永新(285)
- 黃虞稷《千頃堂書目》指誤 李堅懷(323)
- 《四庫全書總目》易類提要辨正 張宗友(347)
- 《四庫全書總目》明別集提要訂誤二十三則 何宗美(361)

- 北京大學國學研究院大事記(2015年7月—12月) (391)
- 徵稿啓事 (395)
- 來稿書寫格式 (396)

世變與應變

——孫應時及其學友在慶元黨禁前後的遭遇與應對

黃寬重

【提要】 從孝宗到寧宗，是南宋學術與政治糾葛甚驟的年代。除大儒名宦捲入旋渦外，一般官僚及道學追隨者也受到程度不一的波及。本文以孫應時及其學友在慶元黨禁前後的遭遇為題，透過個案考察，探討他們面對此一情境所採取的應對態度，期有助於瞭解他們個人仕宦生涯，並提供學界從另一個角度去理解南宋的政治與學術的關係。

一、前言

從孝宗到寧宗的南宋中期，是學術與政治糾葛甚深，也是政治環境變動甚驟的年代。在這段激越的時代裏，不僅皇帝、執政大臣、官僚以及大儒名宦，甚至連追隨道學的一般士人，均捲入政治旋渦中。余英時教授以朱熹（1130—1200）為中心，探討慶元黨禁以前道學與官僚集團之間的糾葛，有很精湛的詮釋。而學界對寧宗以後政局發展與道學被禁的複雜關係，研究成果也相當豐碩。但是，當前研究仍聚焦於名儒大臣之間的關係，討論的範圍並不够全面，論述也不够細緻。

本人近年來探討道學追隨者孫應時（1154—1206）的學宦生涯時，關注他與陸門學友師從的多元性；同時發現這些士人、官僚在面對像慶元黨爭這樣的政治風暴時，其從學背景也影響仕途。更重要的是，探討他們面對此一變局所採取的

應對之策,不僅能够瞭解他們個人仕宦生涯的曲折,也對於全面理解此一時期學術與政治的關係有所助益。因此,透過個案考察的方式,觀察孫應時及其學友在慶元黨禁前後的遭遇,期能從另一個側面,理解南宋中期政治與學術糾葛的過程中,道學追隨者的遭遇與其應對方式。討論對象包括孫應時、呂祖儉(?—1196)、項安世(1153—1208)、石宗昭(1172年進士)、周南(1159—1213)、王柟(1143—1217)等人。

孫應時等六人,在南宋中期政局所扮演的角色雖不盡相同,但他們的分量與對政治的影響較輕,因此在往昔的研究中多居於從屬的角色。而且,關於他們的生平仕歷,雖有《宋史》本傳,或墓誌傳記,但所載事迹過於簡略、片斷,其餘資料十分零碎;孫應時雖有文集傳世,資料相對豐富,然內容分散,文字隱晦。所幸,藉由梳理孫應時的文集,特別是為數不少的他與師友往來的書信,可以看到彼此對時局與職位變動的關切,及討論現實處境的文字,提供了當事人即時性的心情寫照;這對於我們掌握時局乃至個人遭遇與應對的情境,是相當珍貴的一手史料。因此,本文透過蒐集上述六人現存相關文獻資料,以個案的方式,進行較深入的探討,期能從個體的角度,較完整呈現一般士人官僚遭遇的實況,以揭顯往昔側重群體研究所較不能企及的面向。不過,受限於各人資料多寡不一,本文對於上述六人的討論深度與篇幅以及觀察重點,因而不盡一致。

特別要說明的是,孫應時雖不在慶元黨禁所列的名單中,但從他的學習與仕宦歷程,可以看到一個道學門徒在政治環境變動期間的適應之道。慶元黨禁不僅是孫應時及其學友遭逢的政治風暴,更是每個人生命史上的重要轉折點;他們在這場風暴中的處境不同,所採行的對策也有異。透過孫應時自處的表述及其對學友處境的態度,有助於我們更全面認識這種變動甚驟的政治場景。因此,本文將他與被列入黨禁的道學友人一齊討論。

二、孫應時

孫應時長成與任官期間,是南宋中期道學群體在學術上各揭新說、門派競立、相互激蕩,甚且互別苗頭之際,也是他們在政治上為求得君行道而彼此連結、

形成集團、針砭朝政，因與執政的官僚集團相抗拮，形成學術與政治糾結、變動頻繁的時期。他在太學因緣際會地受學於陸九淵（1139—1193），儼然陸門弟子，後又追隨呂祖謙（1137—1181）、朱熹，兼納各家之說，成為學術上轉益多師的道學門徒。在仕進的追求上，他雖通過科考，但受限於家境，缺乏奧援，只得利用各種機會，廣泛經營人脈，求仕途順遂，或在變動無常的政局中，降低衝擊。然而，處在道學與官僚集團糾葛、政局變動甚驟的現實環境中，身為道學的追隨者與基層官僚的孫應時，無論仕途與治學，不免都受到學派競逐與政治爭鬥的激蕩。從他通過進士，並於淳熙五年（1178）入仕，到開禧二年（1206）逝世，前後二十八年的仕宦歷程，將之與政局發展結合觀察，不僅能看到他境遇的變化，也能看到他的應變方式。

孫應時出仕前的求學成長，處於道學各派存異求同的發展初期，得以結識衆多師友、闡揚性理、探索知識、轉益學習、不宗一說；但到朱熹、陸九淵等標舉己說，強調學術傳承及正統地位後，彼此立場鮮明，各立樊籠，讓孫應時身陷門派對立的困境中。如朱熹批評應時受呂祖謙功利學說的影響，說他輕弱，應“痛下功夫，勇猛舍棄，不要思前算後，庶能矯革”^①；陸九淵更對孫應時、石宗昭等門下弟子兼師呂祖謙與朱熹表達強烈的不滿，指斥相當嚴厲^②。凡此皆顯見孫應時夾在朱陸之間左支右絀的窘境，也使他難以在性理的闡發上登堂入室。

儘管如此，孫應時從政時力求實踐道學理念，以彰顯與一般官僚有別的道學價值^③。此一理念，除受道學師儒的影響外，維護道學甚力的元老重臣，史浩（1106—1194）的勉勵尤值得重視。紹熙二年（1191）三月，孫應時出任遂安縣令，史浩在《送孫季和赴遂安序》中勉勵他效法子游在武城以道化俗的典範，涵養士氣，“吾知季和有志於道也……第當優柔涵養以須其成爾”^④，以道化為執政先務。應時上任後，積極復興學校，改變教學，強調道學信念。經過一番努力，“學校成次第，亦頗有佳士”^⑤。對於他在遂安推動教育與傳承儒學的用心，朱熹給予贊許，並云：“學校固不免為舉子文，然亦須告以聖學門庭，令士子略知修己治人之實，庶幾於中或有興起，作將來種子。”^⑥一年後，孫應時在給學生王定的信中，更具體說明其實踐成果，提到久廢的學校已修復，他延聘士儒教授生徒，每十天到學校講學及課試。孫應時在學校旁設周、程二先生祠，也為曾任官嚴州的

張栻(1133—1180)與呂祖謙立祠,準備寫記;於元旦更率鄉里大夫謁社稷,在縣學舉辦鄉飲酒禮與講學。種種作為,顯示孫應時在縣政推動中,特別著力於教育環境的改善與道學理念的實踐^⑦。

其中,最能體現道學理念,突顯傳承道學理念的舉措,無疑是設置理學先賢祠。孫應時在《遂安縣學兩祠記》中,一方面闡明周程三先生為得道之傳,使“聖途闢而百家異端之辨窮”;一方面表彰張栻、呂祖謙弘揚道學之功,“三先生之學中間猶鬱而弗章,三十年來乃大顯於天下,則廣漢、東萊之力為多,《語》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蓋孔子之學亦由七十子尊而守之,非私為黨也”。更重要的是,孫應時藉記文指斥當時官僚集團攻訐道學,表彰了張、呂維護道學之苦心:“世或相與指目姍侮三先生之徒,謂之道學,此正可笑。夫道學豈惡語哉,道學姍則相率為無道且不學而後可乎?陋者又曰:吾學孔孟,何以周程為?曾不知孔孟云者,近世諸儒之語,在漢魏晉南北隋唐未有以孟氏配孔子者也,今習尊孟氏而疑周程,是知以昭祔祖而不復知有穆者耶!”說明立祠的用意是“端車正轍,自歸聖門”^⑧。藉著記文為道學的純正性辯護,反擊惡意批判道學者,在在昭示孫應時是道學的傳承者。

除辯護道學的純正性外,孫應時更請史浩協助消除宋廷多年來對道學的惡意攻訐。紹熙二年二三月間,史浩奉宋廷之召,進京謁見太上皇(孝宗)與光宗^⑨;此時,孫應時正赴遂安途中,得知消息,特別請史浩關切朝廷對道學的打壓。這封信的內容,對於瞭解此時道學之士的處境相當重要,引述如下:“竊惟師相此行,繫天下之望尤重,其於陳戒君德通達言路,薦進人才、宣究民瘼固有素定之論。惟是道學二字,年來上下公共疾之,無能為明主別白言者。漢唐以來,常以朋黨罪君子,猶是加以不美之號。若此二字,不知文義何所諱?惡道學不足用,則無道不學者乃足用乎?原其始,特越中輕薄子立此名,自乙未歲,流入太學,已而嚮布中外,方十五六年耳。其所指數君子,果誰以此自標榜?今天下場屋議論,通共竊用程、張諸儒之說,有司不非之。至於平居,稍稍見諸言行,輒曰詭世盜名,此甚不可曉,恐後世之史,書朝廷諱惡道學,實翺起於今日,永以為笑。欲望師相特救此事,遂消此名,用賢獎善,付諸公論,天下幸甚。”^⑩從信中可以看到,孫應時想藉史浩在孝、光二帝心中的特殊分量,化解道學士人的艱難處境。

孫應時的《兩祠記》以及給予史浩的書信，點出自孝宗以來，道學士人遭受反道學官僚集團糾纏的苦境。尤其是與史浩的書信，說明道學士人蒙上惡名，乃自孫應時剛由太學考上進士的淳熙二年。這一說法與朱熹在淳熙十五年的《戊申封事》所說“一有剛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間，則群譏衆排，指爲道學之人，而加以矯激之罪，上惑聖聽，下鼓流俗。蓋自朝廷之上以及閭里之間十數年來，以此二字禁錮天下之賢人君子”^⑪的時間相近。可見自孝宗淳熙以來，道學與反道學集團之間矛盾益深，對立之勢明顯；其所以如此，與兩集團政見相左，以及孝宗任用近習、計劃恢復，均有關係。先是孝宗任用近習，遭到道學名宦呂祖謙、張栻等人的批判與抵制，官僚集團遂以宰相龔茂良（？—1178）植黨，掀起黨論^⑫。接着，謝廓然（？—1182）藉批判科舉，表面上兼攻王、程之學，實則以程學爲對象，儼然開啓了攻擊道學之門。直到淳熙五年三月，史浩第三次任相後，積極拔擢道學士人，並極力勸解與辯護，讓孝宗表明不以朋黨待臣下，才稍稍平息黨論之說^⑬。

然而，官僚集團對道學的攻擊並未停歇^⑭。特別是淳熙九年以後，朱熹成爲道學領袖，連章彈劾唐仲友（1136—1188），掀起官僚集團一連串以“道學”之學爲名而針對朱熹的攻擊。最具代表性的是鄭丙（1121—1194）所說“近世士大夫有所謂‘道學’者，欺世盜名，不宜信用”^⑮，直指朱熹爲這一群體中的主要人物。接着陳賈更指控道學之徒，飾僞沽名，植黨分朋，是朋黨的群體^⑯。淳熙十五年，朱熹以足疾辭孝宗任官之詔，引來兵部侍郎林栗（1142年進士）上書論奏，他沿襲鄭丙、陳賈以來之說，指出：“熹本無學術，徒竊程頤、張載之緒餘，爲浮誕宗主，謂之道學，妄自推尊。”^⑰這一連串的指控，不僅激發朱熹如上所述的激烈反彈，也引來葉適（1150—1223）的駁斥：“栗爲侍從……更襲用鄭丙、陳賈密相付授之說，以道學爲大罪，文致語言，逐去一熹。”^⑱可以說自淳熙十年以來，以朱熹爲首的道學群體，正面臨四面圍攻，使朱熹在政治上陷於孤立。此時張栻、呂祖謙已死，道學門派在學術上競相爭鋒、各立藩籬；但政治上卻積極結盟、相互支持，陸九淵、尤袤（1124—1193）、樓鑰（1137—1213）與葉適，都相繼挺身而出，爲朱熹與道學辯護^⑲，甚至將矛頭指向當朝宰相王淮（1126—1189），直指鄭丙、林栗都是王淮黨人。因此，擁護或反對道學的勢力，正式以朋黨之名，作爲政爭的

標的,其情形正如楊萬里(1127—1206)所說:“朋黨之論何其紛如也?有所謂甲宰相之黨,有所謂乙宰相之黨……有所謂道學之黨,有所謂非道學之黨。是何朋黨之多歟!”^②可見兩個群體對立攻訐之勢鮮明,道學群體處境相當艱辛。

光宗繼位之初,對道學轉趨有利。先是反對道學的宰相王淮已罷,主政的周必大(1126—1204)與留正(1129—1206)雖然亦相互傾軋,但朝中道學勢力凝聚,強烈回擊反道學的批判。除上述楊萬里的委婉批判,紹熙元年春,被拔擢為殿中侍御史劉光祖(1142—1222)上書光宗,指遭貶斥的道學者“率多善士……若俱擯斥,安得更有好人?”呼籲光宗“永為皇極之主”,使“道學之譏由此而消,朋黨之迹由此而泯”^③。不久,光祖被命參與舉士,士人遂多於策論中抨擊反道學的官僚集團。如兼師呂祖謙與朱熹的王介(1158—1213),與葉適的學生周南,在廷對策中,都極論反道學者攻擊道學釀成朋黨之禍^④。殿中侍御史林大中(1131—1208),也於七月劾罷曾攻擊道學的陳賈^⑤。此一形勢對道學群體而言,是一個化解多年來被壓抑狀態的良機。

正由於政局的轉變有利於調整朝廷對道學的態度,孫應時便力促史浩請朝廷消彌對道學的誤解。身為道學門徒的孫應時,既承受陸、朱道學教誨,平時與師友相互砥礪,任官則實踐道學教化理念,多年來雖未直接遭受攻訐與挫折,卻也感受到道學受傾軋的壓力。另一方面,孫應時多年來親近史浩,十分瞭解史浩在高、孝二帝心中的地位。史浩是孝宗的老師,他在孝宗即位後二次任相的時間都很短,不居相位時,仍受高宗、孝宗信任。高宗曾對他說:“卿再入相,天下之幸也。”^⑥罷相後,史浩在京宮觀兼侍讀、侍經筵;淳熙八年雖告歸,仍時召賜^⑦。而紹熙二年正值孝宗、光宗權力交接之際,朝廷詔史浩入京,甚至傳言可能將授予要職。當孫應時得知消息後,認為這是道學發展的良機,即致書史浩,請其向朝廷建言,勿再壓制道學,乃至於進用道學士人:“欲望師相特就此事,遂消此名,用賢獎善,付諸公論。”^⑧朱熹基於史浩對道學士人的親善與提拔,也於此時致書應時,關注史浩的行止^⑨。

史浩入京,備受道學門徒的期待。事實上,朝廷詔史浩入京,乃是在孝宗、光宗父子失和之前,殆為孝宗退位後,期與老臣聚敘,以及光宗向元老請益之舉,並非如孫應時等人所期待的將出任“平章軍國重事”等要職。儘管如此,史浩數度

建言，強調“收天下之人望，伸天下之直氣”，目前雖無從得知具體內容，但當對久受壓抑的道學有一定的紓解作用^②。此一氛圍，與此後光宗朝的留正乃至趙汝愚(1140—1196)相繼執政的作為相結合，實有利道學發展，這也是孫應時以道學門徒自持，且積極推動教化理念的重要時期。

孫應時既以道化實踐為要務，則視官賦簿書及刑獄等日常行政為庶務。如前所述，史浩在贈序中所期待於孫應時的，不是汲汲於簿書期會，徵利以趨目前之急的俗吏，而是期許他效法子游在武城以道化俗，涵養士氣為要務^③。孫應時接受教誨，在遂安任上，專力實踐道學理念，相對疏於吏政，因此常向師友抱怨陷於庶政與人事的困擾。如致書池從周提及“某守官奉親粗安，邑小事繁，辦財計最勞，無復觀書之暇”^④；與杜子真的信則自云“某作邑一年所經歷益多，其間做不行處，及意外相加，可為不平者，皆是自家力不及，德不盛致然，舉無可尤人之理”^⑤；給詹炎(1193年進士)的信也說：“為親求祿之故，而冒昧自試於方五六十之邑，其間俯仰時俗，牽迫時勢，悖古義而違初心多矣。”^⑥這種富理念但困於庶務，顯現吏事非所長的矛盾，在道學士人之間殆屬常情，也是道學士人有別於一般官僚之所在。而此一情況正是道學家常招致攻擊的重點，余英時曾舉知衡州劉清之(1134—1190)在淳熙十四年遭言官彈劾的罪狀作為案例：“以道學自負，於吏事非所長，財賦不理，倉庫匱乏，又與監司不和。”^⑦此所呈現的正是官僚集團與道學群體相異之處，也是道學群體遭受攻擊的重點所在。但這類稍早對劉清之的攻擊，在孫應時主政遂安期間，因值道學氣勢正盛及史浩的影響力猶存，並沒有成為被攻擊的對象。

寧宗繼位之後的政局發展，無論對孫應時個人或整個道學群體而言，都構成更嚴重的挑戰。光宗時期，道學與反道學之間的鬥爭雖時掀波瀾，但到了紹熙四年，趙汝愚執政後，道學群體便顯居優勢^⑧。次年七月，孝宗崩逝，光宗堅不執喪，朝野震蕩，宰相留正去國，引發國政危機；在趙汝愚、韓侂胄(1152—1207)與趙彥逾(1160年進士)合謀下，由吳太皇太后出面，擁立嘉王繼位，是為寧宗。寧宗即位之初，趙汝愚獨掌政柄，擢用道學官僚，布列要津，又召朱熹任經筵講讀官，一時之間，朝中道學勢力達於巔峰。然而，此一榮景很快隨着趙汝愚的罷黜而逆轉。先是在策動內禪過程中，居中聯繫的韓侂胄，在內廷日見親幸，影響力

日益增強；而趙汝愚以策定功臣獨攬大權，又不願其分享權力，引發韓侂胄與趙彥逾的憤懣，雙方矛盾驟劇。身處外朝的道學士人，極力防止“近習”竊取權柄，朱熹即以“主威不免於下移”^⑤深戒寧宗，提防韓侂胄之干政。對此，韓侂胄運用內批與控制台諫的方式，首先將道學領袖朱熹逐出國門，貶罷營救朱熹的道學官員劉光祖、陳傅良（1137—1203）、樓鑰、孫逢吉（1135—1199）、項安世、吳獵（1143—1213）等人；進而將目標轉向趙汝愚，由右正言李沐（1172年進士）以“同姓居相位，非祖宗典故”“乞罷汝愚政柄，以奠安天位，塞絕姦原”之由奏劾趙汝愚^⑥。朱、趙的貶罷，使道學群體在朝中群龍無首。此後，韓侂胄等人爲了進一步提升打擊道學群體的力道，迅速發展出僞學、逆黨等一連串嚴重的整肅名目。追溯其源，這都是從紹熙五年到慶元元年（1195）一年內政局驟變所致。

紹熙五年也是孫應時生命歷程中的重要轉折點。孫應時於此前入蜀協助丘密（1135—1208）處理蜀政有功，隨後獲其諒解，辭職返鄉主持長兄喪禮、孝養老母，且獲得薦書由選人登上京官，擺脫基層官職的困境。正如孫應時在《謝廟堂啓》中所說：“累日何功，幸脫選階之冗；自天有命，許班朝績之華。叨異數以若驚，凜微蹤之增懼。鈞陶所播，門戶知榮……免從計簿之卑棲，謬掌籌邊之秘畫。一辭月峽，三佐星臺。人方議其素餐，己亦慚於蠶等。”^⑦

但不幸的事接踵而來。他的老師陸九淵與親近的長者史浩相繼去世，另外兩位師長朱熹與丘密，則在瞬息驟變的政局中相繼被罷，這對力爭上游的道學門徒孫應時，不啻爲沈重的打擊。先是在趙汝愚主導下，宋廷於紹熙五年四月，對安定吳挺（1138—1193）死後的四川政局有功的丘密予以再任，並謫令褒獎；而同年八月五日，宋廷除朱熹爲煥章閣待制侍講，並令急速前來供職^⑧。一時群賢畢集，情勢看似樂觀，但乍然離蜀東下的孫應時，卻嗅到政局不安的氛圍。首先，孫應時於七月抵家後，給丘密的信中提到光宗、寧宗繼位之際政局詭譎難測的發展，充滿不安的語氣：“於今遂踵故事，傳祚嗣君，遠書不敢盡布，終當若何。”^⑨稍後，在致呂祖儉信中，也表明對朝政的憂慮：“上疾廢於喪紀，慈福出令，遜授嗣君，雖盛典踵行，古所未有，然區區草野私憂，未知諸公爲後日慮亦周盡否？非所敢妄言也，兄當同此意耳。”^⑩雖語帶隱晦，卻已表露憂慮之情。寧宗繼位後，朱熹再入國門，孫應時在致書祝賀的同時，更透露了他所察覺的政局變化的信息。

一方面，孫應時對朱熹新職充滿期待，“中夏抵家，則聞先生亦已視事長沙，入秋又聞命召，固知先生必不得辭……竊計今茲日侍經幃，格心正本之業，天實啓之，宗社幸甚，斯文幸甚……逢嗣皇聖德日新。宗臣身任天下，求諫進賢。如恐不及。我宋列聖垂休累德。中興之運意其在茲”^④；另一方面，則對穩定四川政局有功的丘密突然遭罷，使身為幕僚的他陷入困境，因此無法赴京拜見：“欣聆恭叔（潘）之報，誠然欲亟渡江侍師席，然尚稍牽制。且丘丈遭臺評，下客贊畫無狀，又有觀其所主之愧，固當伏匿，少定乃出，十一月之末或可省拜也。”^⑤丘密之被罷係新任御史中丞謝深甫（1166年進士）以丘密“其蛇虺之青，虎狼之暴，肆虐以濟貪，怙勢以行詐。到官方一年半，而西蜀軍民、士夫無不怨憤”為由，加以彈劾^⑥。丘密仕途的榮枯驟變，原因複雜，但顯然與丘密在吳挺死後，處理蜀政行事激越有關。宋廷急遣曾任四川總領，有惠政於蜀，並參與立寧宗有功的趙彥逾取代丘密；一來期待藉由趙彥逾的資歷與德望，得以調和緊張的四川政局，也企圖降低趙彥逾留在中樞對朝政的壓力^⑦。長官既罷，加重孫應時的擔憂，而這種“變化”，讓孫應時對時局及朱熹的未來產生不安全感：“然而哀敬危懼之心，正未可頃刻釋也，深思長慮，厥惟艱哉。先生此來，上下之望至重，義不可以苟退，而志或難於遽伸……起弊扶衰，似非因陋就簡所濟。”^⑧

果然，趙、韓的政爭很快便見分曉。十一月一日，朱熹被罷出廷；慶元元年二月戊寅，趙汝愚罷右相^⑨。孫應時的好友呂祖儉也因救援遭罷的趙汝愚、李祥（1128—1201）、楊簡（1141—1226）等人而被貶。在短短的半年之間，孫應時親近的師友可說由榮驟貶。此時，在家營喪長兄並等待新職的孫應時，處境甚為艱難。他杜門不出，幾無與外界聯絡；僅見的一封信是大約在慶元元年冬天致於呂祖儉的。該信提到“臨風太息，徬徨侘傺，尚復何道，久欲附問，村居僻寂，杜門省事，不敢輕於訪便，坐成相疏，然間從諸人處傳聞近況甚強耐，日課讀書無休暇時”，更希望處身艱危的祖儉，不要“矜於得名，以慙其上”^⑩。身為道學中人的孫應時，面對政局的驟變，只能與舊識保持距離。但身負家業重擔，他仍得尋找出仕的機會，最後選擇出任賦役參雜、職任甚重的常熟知縣。慶元二年四月，孫應時抵達常熟，除謹小慎微的處理縣政外，不敢對現實政治多發表意見，這可從他三次致書丘密的内容得到印證。第一信說明慶元元年春登門侍教後，未曾致書

的原因：“蓋僻居蓬藿，無端便且不敢輕瀆嚴重，而又撫事太息，難言輒止，以故雖負曠怠之罪，尚恃恩私，必賜原察。”^④第二信論及蒞任後受困於縣務，“心煩目昏，作字如隔煙霧，以故闕於通敬，尚冀憐察”，但是，縣政雖然辛苦，“然視比年諸人榮悴升沈之變相尋，幸自以不才，自分泥塗，雖實辛苦，尚差平淡，委之於命，亦復何言”^⑤。這種對時政敏感、謹慎的態度，孫應時在另一封致丘密的信中曾有明言：“別後僻處海濱，素懶作書，書亦不敢盡言，且復無便，遂成曠闕。”^⑥總之，縣務的繁重，成了孫應時在政治環境緊張之際與師友保持距離的重要理由，即使有書信聯絡，內容也相當隱晦。

到常熟後，黨禁的壓力，讓身為道學門徒的孫應時在心境上有明顯的轉變，這從他在慶元三年給師友的書信可略窺一二。這一年孫應時除修書三封與常熟有關官員外，另外致信給項安世、史彌堅（？—1232）、呂祖儉、朱熹、石宗昭和趙彥逾。除給史彌堅屬一般應酬期許之語外，其他五信均有助於瞭解他的心境。他給呂祖儉的信說：“著鞭自彊，無愧古人是望。然賓客書疏，語言文字之間，卻須深自重也。”^⑦希望祖儉慎重發言，以免再招惹禍端。而在是年冬天給朱熹的第十信，除報告自己到常熟任職以來“守愚安分，粗得全身”，目前上下相安，並再請朱熹為其父孫介寫墓誌及寫祠子游的記文外，有相當多的篇幅是在深切檢討慶元元年以來興起黨禁的緣由。“而比年事變如反覆手，死者沈痛，生者轉繁異方。然且屏心氣，務在拔本塞源，在先生可謂據高履危而獨蒙全宥，天也，抑猶有未可知者，泰然俟命，當復何道，追惟所以致此，在當時諸公亦不得不任其責，用大匪易，知幾實難，徒使後人終古太息，未審尊意謂何如也。”^⑧

同年春，孫應時在給項安世的第三封信中，既同情安世自慶元元年以來任罷相繼、處境艱辛，更感慨諸賢對時事轉變的敏感度不足，所謂“不早自鏡見”，因此而懊惱。孫應時也訴說自己在常熟一年的處境與心情。他感到自己處於“瞶眊盤錯之中，不敢憚勞，聊復隨分枝拄，禍機滿地，無可避就，委心聽命而已”，加上自己與老母均患病，“志意愈衰落，四方師友書問例絕”。孫應時並期勉安世，“間中當復讀書，平生定氣，覺今是而昨非，造物之賜適大，何由復相見熟論茲事，惟加飡食自愛是祝”^⑨。從這些書信的內容，都可以看到黨禁開始之後，孫應時與道學師友的遭遇及鬱悶的情緒，對現況與仕途所顯現的消極與無奈。

更值得注意的是，孫應時在面對縣政難題時，請求協助的對象，明顯轉向、接近新的領導核心。慶元三年七月間，孫應時以鄉黨子侄的身份，給剛由四川轉任江東安撫使兼知建康府事的趙彥逾致信^⑤。趙彥逾，字德老，廷美七世孫，紹興三十年進士^⑥。孫應時在信中對趙彥逾三年的蜀政極為推揚：“三年之間，六十州之民，歌詠清靜寧一之治，咸曰前所未有，善良得職，貪狡革心，不勞施爲，坐以無事；外及蠻夷，擾馴如子，三邊安堵，一塵不驚，海內傳聞，同詞欽嘆。上心眷眷，袞衣召歸，意將朝夕咨謀大政。”孫與趙的相識殆於紹熙五年，孫應時出蜀返鄉後，於當年十一月，在紹興曾謀見奉命代丘密任蜀閫的趙彥逾，然未果，遂通書信。孫應時自感地理與身份差距均遠，“不獲以時申貢寒暄興寢之間，非敢懈怠”。這封信的內容，出自一個丘密親信幕僚的文字，不僅從另一個側面對比丘密治蜀的強硬、對付吳氏的勇猛，也透露出孫應時在常熟身陷孤立困頓之時，另尋奧援的苦心，所以有“仰恃鈞慈有以教誨而存芘之，是所大望”的期待^⑦。次年四月，趙彥逾辭官時，孫應時再次致書，述說自己受繁劇政務所擾，未能於其返鄉途中親自陳述“欲言之惘”，希望彥逾念其故人之子“孤危獨戰於風波機穽之間，僥倖再考，未知所以善後”，請他“得於經從之地，臺府款謁之際，借以一言爲保全計。他日歸侍綠野，趨走前後，不爲相公差”^⑧。及趙彥逾休致後，孫應時與趙彥逾仍有聯絡，這可以從他與樓鑰的交往察知。樓鑰爲趙彥逾的藏書樓賦詩，應時即有詩相和，並表達感恩之意：“寒生感公恩義重，草根竊亦吟秋蟲。”^⑨顯而易見，孫應時在常熟執政遭逢困難，又陷於孤立無援之時，爲謀順利離職，只好卑屈地求助於對朝政仍具影響力的趙彥逾。

在黨禁後，任職常熟的孫應時也曾經乞助於位居執政核心圈內的張孝伯。張孝伯，字伯子，自號篤素居士，生於高宗紹興六年，父張邵，居萬山，從兄爲張孝祥。孝伯於紹興二十四年入太學，登隆興元年（1163）進士第。淳熙元年至四年擔任常熟縣丞，紹熙五年一月十日除國子監丞。因其妻韓氏爲韓侂胄族人，張孝伯得韓侂胄提拔，短期內歷任高官，慶元元年即任監察御史。孫應時與張孝伯先前並無淵源，一直到慶元三年左右，孫應時抵常熟蒞位後一年，以州里後輩向曾任常熟縣丞、時任起居郎兼刑部侍郎的鄉賢張孝伯請益^⑩。信中先贊孝伯：“自聆際會休明，超歷顯要，素望增重，上眷郅隆，區區竊與士類有喜相告，然豈

敢犯分奏記，以取無因至前之罪。”但由於常熟縣務“盤錯輻輳，不與他等”，而張孝伯曾在此任職，“知之實詳”，希望能“垂慈借重，俾得稍布四體”^⑩。孫應時在信中稱孝伯為右史，當係二年九月孝伯奉使至蘇州，因而可以得知書信時間正是他擔任起居郎兼權刑部侍郎之時。此後二人互有通信。慶元四年，張孝伯改任吏部侍郎兼實錄院同修撰，又兼侍講，官位正盛；孫應時再函感謝，“側聞大君子在朝主盟公論，為國元氣，位任愈重，望實益尊”，而自己在常熟的處境十分艱難，幸得孝伯暗助，才能稍釋謗忌，“（某）冒昧試劇，日履危機而游沸鼎，委心聽罪，何敢以螻蟻之蹤，上干法從近臣，以傲倖萬一，為自全計？曾謂前輩大人每因誤聽，特垂記憶，過誤之日，首為府主齒及姓名又於廣坐誦言，深示褒借之意。遂使孤寒增氣，謗忌稍釋……門下之於某，是有非常之大造，某何以稱塞，感激惕懼，大恐自毀平素為門下羞”，特別寫書致謝^⑪。孝伯賜札，加以慰勉，並向知平江府兼浙西提刑的同年好友虞儔（1163年進士）疏通，致“府帖亟下，督取已發緝頗威，後遂輟止，而又自此凡百寬假，終於見知”。虞儔與孝伯的關係頗佳，曾薦應時陞陟^⑫。由於孝伯暗中協助，應時的危機一時化解，甚至傳聞孝伯有向朝廷露章推薦之舉。及新任平江守劉誠之蒞職，督責稅賦逾厲，孫應時處境又陷艱難，孝伯也設法替應時解圍。孫應時給張孝伯的第三封信中就說：“侍郎每對賓客，及於新使者太守之過辭也，往往語及下邑之敝劇，而不以某為有罪。又至於頑民不根之謗，皆陰賜之辨明，使折牙角，以沮其餘。”“門下之特達施恩於某者，可謂天下之所無，而古人之所罕及矣。”^⑬

可以清楚看到，在孫應時處境最艱難的時刻，由於最親近的師長丘密與朱熹都遭罷黜，彼此只能訴苦而無力相救，為化解危機，他轉而尋求與韓侂胄關係密切的趙彥逾與張孝伯二位鄉里前輩的協助。然而，由於接替的知縣朱壽拖延不肯交接，加以知府趙不艱與提舉任洙、提刑朱致知都到任不久，未能鼎助，或至遷怒，羅織罪名，遂使孫應時遭遇不幸。儘管應時對於地區文化傳承費盡心力，如為樹立典範的子游建祠立碑、標舉地方文化傳統，乃至於編輯《琴川志》，都是落實道學、推動教化的理念之具體作為，但終未能在財賦徵收與簿書庶務上滿足上級的要求，遂遭致被劾罷官的命運。

在孫應時人生最困頓的時候，也是在張孝伯的救護下，才得以平反。孫應時